



如何幫助青年 踏上宣教路

滕張佳音/
香港建道神學院
跨文化研究系副教授

在 宣教或基督教圈子，我們對青年人投身事奉，會不會設了很多障礙？讓我們返回聖經，其實無論在舊約還是在新約，上帝都使用年輕人。他們面色光紅，容貌俊美；年輕就是美。在近代西方宣教歷史中，能夠闖出一片天，開拓新天地的宣教士都是很年輕的，才二十多歲，便被差派出去。上一世紀的普世宣教運動，便是由西方年輕宣教士所推動，特別是由大學學生運動產生的。如美國麻省大學的「乾草

堆」禱告會，後來衍生了海外宣教學生志願運動，也影響英國，激發「劍橋七傑」。學生志願運動其中一個領袖穆德(John Mott)，他在1910年成為愛丁堡世界宣大會的主席，發動近代普世宣教運動，到今年已經一百年了。在西方宣教歷史中，年輕大學生擔負很重要的角色。影響今天北美的宣教運動，同樣是在大學校園開展的。國際校園宣教事工(InterVarsity)每3年一度的青年宣大會(Urbana)，是一

個為期5天的活動，每屆都有萬多二萬人參加。自1946至2006年短短60年間，共差派212,000多名年輕基督徒作長期及短期宣教，平均每年有3,533人。2009年的青年宣大會，便有15,800多名年輕人出席參與，參加的神學院或機構有256家。國際校園宣教事工在基督教及非基督教大學有很多校園工作，校園工作點共530多個。2009年，有5千多名年輕人願意投身兩年以下的短期宣教工作，願意委身兩年以上的年輕人則有2,676名，這是令人感動的事！

西方仍然非常著重在大學生群體中

招募宣教士。我曾參與1995年普世福音遍傳諮商會議(GCOWE)。我們4千多名國際代表，被邀請到首爾奧林匹克運動場，與8萬多名大學生坐滿整個場地。當時下著濛濛細雨，卻一點也沒有影響大學生的熱情。他們以浪式高聲讚美，不單願意委身到北韓宣教，還要到普世宣教，回應的人很多。我們從中窺探韓國的宣教運動為何如此熱切及不斷延續，原來韓國教會及韓國家庭都以有弟兄姊妹及子女願意投身宣教為榮，不會像我們華人，當子女表示要投身宣教時便大皺眉頭。

為甚麼華人教會會缺乏宣教士，



特別是年輕的宣教士？這正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課題。現時香港只差派400多名宣教士，這已包括了小組教會，造成宣教士數目有增長的假象。其實，一般傳統教會差出宣教士是不容易的。雖然大部分教會會以禱告、以金錢奉獻支持，或「領養」其他教會差遣的宣教士，但真的由自己堂會差派，特別是作跨文化宣教的年輕人，實在是寥寥可數。即使年輕人願意起來宣教，或是接受神學訓練，我們一般都會拖延他們。為甚麼我們有「拉他們後腿」的想法？我自己也曾作

檢討，因為我也是這樣的一個人。當與神學生面試時，便不斷的質疑他，潑他冷水，認為他的熱情不被潑熄才可以；這樣一直潑他冷水，直至認為他夠成熟為止。我們心裡是先有了申請人未夠成熟的假設。我的反省是，成熟的定義是甚麼？為甚麼總是把他們的申請拖延？

父母心裡總覺得宣教工作沒有前途，尤其是只有一個孩子的父母而言。供書教學這麼多年，將全部心思都放在他身上，務要培育他成才。因此，當他說要奉獻作傳道時，父母便會加以勸阻；如果說要去宣教，反對聲音便更大；若說要去第三世界宣教就更不得了。說到底，就是捨不得。

我去年參加華福在菲律賓舉行的姊妹宣大會，出席的有不少東南亞華僑，他們都捨不得子女踏上宣教路。他們是生意人，最重要的是子女承繼家族生意。子女說要去宣教，當然不可以；即使退一步，也是女兒可以去，兒子不可以。東南亞的神學院，學生大部分是女的。本地生意人



願意奉獻子女是很難的事，這是值得華人教會檢視的問題。

在香港，調查顯示越來越多教會為了吸引青少年人，開設青少年崇拜。據統計，1999年有3,500多名青少年參加青少年崇拜；到2004年，人數已增至萬多名，有兩倍的增長。這寶貴的下一代，我們如何伴著他們成長？是否培育他們成為專業人士，讓他們帶職事奉便可以了，奉獻金錢便足夠了，還是要推動這群年輕人，讓他們有宣教的使命，培養他們成為新一代的宣教士？

我們要思想這新一代的面貌。近日常提到「八十後」這個詞彙。廣義來說，「八十後」是指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。狹義來說，是指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。早前香港社會學者呂大樂界定，八十年代後出生的為戰後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，他們平均學歷高，收入低，無空間、無機會上位，是注定失敗的一群。呂大樂的言論引來社會很大的爭議，他的論點在當時來說也相當前衛。但在我們眼中，是



否看「八十後」要不就是參與社會運動，要不就是熱衷於動漫、打機、追星的一群？

有句話說「一代不如一代」，但我不喜歡這種說法。每個年代都要面對時代的挑戰，正如我不可以用我當年讀神學的材料來教導這一代的神學生，因為他們有更豐富的資料、資訊。2006年中期人口調查報告顯示，「八十後」的學歷比我們那一代高，因為他們完成大學後才到社會工作，相比我們那一代，在中三或中五便要到社會工作了。因此，「八十後」其實有正面值得欣賞的地方，我們要善用他們的強項。他們有學問、有理想、會獨立思考、有感情，

不只關注政經發展，還關注保育、文化和歷史的傳承，這是我們上一代失落了的。用一個宣教的術語“glocalization”來形容，他們既有國際的視野，亦著重本土的價值。他們參與政治和社

會運動，讓我看到另外光明的一面。其實，在其他國家發生抗爭、示威時，警察常要用催淚彈對付；相比之下，香港的年輕人算是克制了。而且，他們在鬥爭的過程中也具創意，又有動員力，可以透過Facebook召集同路人參與社會運動。教會中也有同類的年輕人，我們怎樣牧養和動員他們的使命感，讓他們投身神的國度中？

還有越來越多的移民和海外公幹人士的下一代，這些都是具有國際廣闊視野第三文化的孩子（the third culture kids），也稱N世代。這類孩子隨著父母流徙，他們不需要做宣教士，便已體驗第三文化！他們因為有跨文化體驗，

所以工作或生活，都會選擇跨文化的模式。我在芝加哥三一神學院進修時，很多同學都是宣教士的第二代。他們不會認為隨著父母走，是被父母虧待了，反而有積極的看法，欣賞並願意跟隨父母的腳蹤。Dr. Paul Hiebert說，這一類年輕人很多時會選擇當人類學家或外交家，不斷讓自己活在跨文化中，因為這是他們最能適應的生活。對這類年輕人，我們又如何接觸他們？宣道會北角堂便有這樣的年輕人，開始了英語崇拜。第三文化的孩子多有大學學歷、具備多種語言能力，容易體會和了解不同文化的衝擊，更懂得善用網絡作溝通。這班年輕人，我們怎樣帶領他們去體會神國度的偉大，招募他們成為宣教大軍？

香港神的教會雖然被部分人認為是異端，但其實他們的教會觀是認為自己較屬靈，與其他教會較少溝通而已。他們很早便動員弟兄姊妹作海外宣教，一隊十多人，在當地找工作，輪流支持其中一人全職宣教，結合帶職宣教和開荒植堂，不用教會支持他們的經費，全隊人自給自足。這與19世紀莫拉維亞弟兄

會發動的信徒宣教運動相似。當時的信徒宣教運動，60個信徒當中便有一個被差派當宣道士，比例相當高；相比當時世代的其他信徒，5,000個才差派一個宣道士。今天歷史又再重演。綜觀香港的教會，20多萬信徒當中只差派了400多名宣道士，這是值得我們反省及檢討的。

耶穌基督很愛年輕人。聖經說少年的官來問耶穌如何得到永生，耶穌挑戰他變賣一切來跟從祂；而我們作父母的，卻要子女成才、少年得志才算美好。耶穌所要的，不單是愛主的

年輕人，而是要他們放下名利的捆鎖，跟隨耶穌。耶穌挑戰我們新一代的年輕人走上宣教路。當然創啟策略帶職宣教需要有學識，但我們也要給年輕人宣教的挑戰，不要讓他們只有世間的學問、高薪厚職，而拖延他們走上屬靈的路。我挑戰基督徒父母，你們捨得讓子女踏上宣教路嗎？你們有沒有培育他們成為宣道士？家庭是培育宣道士的橋樑。提摩太之所以成為提摩太，是因著他的外祖母和母親；戴德生之所以成為戴德生，是因著他的祖父，是一代影響一代的。

有關華人的宣教歷史，我特意介紹《拓荒南洋》這本書。我鼓勵各差傳部長在其堂會推介。這書搜羅最早期建道校友的宣教故事。雖然當時學院沒有差傳系、跨文化系，但他們仍走上宣教路。他們是年輕的一群，還未畢業，院長翟輔民便帶領他們到南洋短宣，到他們一畢業，便調兵遣將，到越南金邊等地方留下佳美腳蹤。他們是華人宣教史的前輩！上一代的宣道士，在戰亂時候，在很缺乏

的情況下，把孩子和妻子送回家鄉，自己繼續留在工場，20多年見不到親人。我們不會要求這一代的宣道士遵循同樣的模式，因為所面對的境況不同，但先賢的事蹟，也很激勵我們的心志。

教會怎樣培育新一代的宣道士？是要由兒童主日學開始。西方教會很早便讓兒童接觸宣道士的事蹟，奉獻支持宣道士。西方宣道士年輕便出發，不是偶然突發的，而是他們的父母把宣教的意識從小便融入在他們的生活中，培育他們成為宣道士。有宣道士回來述職時，便帶他們聽宣道士的分享；在家中張貼著宣道士的照片或信件；吃飯前先為宣道士禱告，預備他們。那年代，坐船到中國宣教得花上至少半年的時間，但父母也讓他們出發。戴德生蒙召的時候正修讀醫科，但這不成為他的障礙。他找緊機會到中國，日後有機會才回國進修。



西方的華人教會用短宣作模擬的體驗，讓青年人清楚自己的信仰；參與扶貧助學，讓第二代的青少年深深體會貧乏群體身心靈的需要。我們如何活用教會的宣教年會，成為整個教會的宣教教育？如何籌辦活動，讓青年人更認識宣教？

年輕人踏出宣教，需要整個教會和家庭的培育。我們要給他們機會，帶領和鼓勵他們，而不是把他們拖後，攔阻他們。

(本文乃滕張佳音博士於5月4日本會舉行之差傳部長會議中分享的部分內容)

